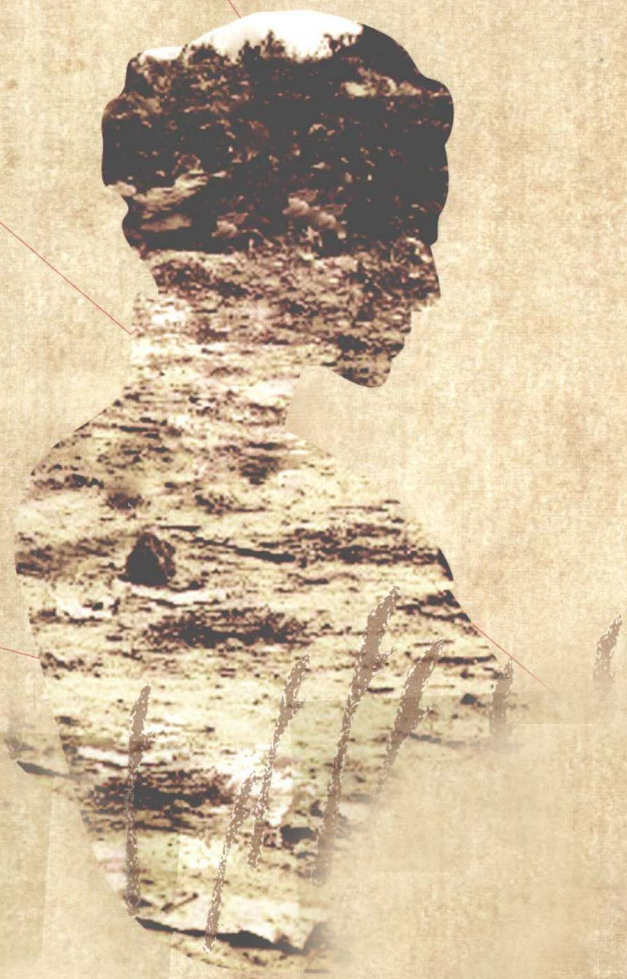


# 太阳底下

罗伟章 著



# 太阳底下

罗伟章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阳底下/罗伟章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 -7 -5063 -6400 -3

I. ①太… II. ①罗…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86592 号

## 太阳底下

---

作 者: 罗伟章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观禾品牌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60 千

印张: 19.75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063 -6400 -3

定价: 28.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目录

序 篇	一口神秘的箱子	1
第一章	杜芸秋访谈录	11
第二章	黄晓洋日记（17日）	19
第三章	黄晓洋日记（18日）	30
第四章	杜芸秋访谈录	36
第五章	父亲的来信	39
第六章	杜芸秋访谈录	54
第七章	黄晓洋日记（22日）	58
第八章	杜芸秋访谈录	66
第九章	致父亲的信	71
第十章	黄晓洋笔记	75
第十一章	黄晓洋日记（7日）	77
第十二章	杜芸秋访谈录	87
第十三章	明月河	95
第十四章	杜芸秋访谈录	99
第十五章	黄晓洋日记（14日）	103
第十六章	父亲的来信	112
第十七章	黄晓洋日记（27日）	119
第十八章	杜芸秋访谈录	124

第十九章	杜芸秋访谈录	128
第二十章	黄晓洋笔记	140
第二十一章	黄晓洋日记（11日）	143
第二十二章	意外之一	148
第二十三章	李小楠的眼睛	154
第二十四章	黄晓洋日记（31日）	171
第二十五章	杜芸秋访谈录	174
第二十六章	黄晓洋日记（8日）	183
第二十七章	黄晓洋日记（15日）	186
第二十八章	杜芸秋访谈录	191
第二十九章	致父亲的信	204
第三十章	黄晓洋笔记	212
第三十一章	黄晓洋日记（3日）	214
第三十二章	杜芸秋访谈录	225
第三十三章	黄晓洋日记（23日）	230
第三十四章	黄晓洋日记（12日）	235
第三十五章	杜芸秋访谈录	240
第三十六章	黄晓洋日记（18日）	244
第三十七章	黄晓洋笔记	251
第三十八章	父亲的来信	252
第三十九章	意外之二	266
第四十章	黄晓洋日记（5日）	272
第四十一章	杜芸秋访谈录	276
第四十二章	朋友的证词	285
尾 篇	太阳底下	303

## 序 篇

### 一口神秘的箱子

下雪的日子，总是让人有所怀想。

其实也说不清怀想什么，可心里就是蠢蠢欲动的，带着游丝一样的愉悦和清愁。

我就是在一个下雪天的早晨，接到了孙文博的电话。文博是我大学同学，也是最忠诚的室友，从大一到大四，寝室里的人换来换去，只有我俩自始至终守着老巢。现在，文博在重庆某政府部门任职。

他打电话告诉我：重庆也下雪了。他说你知道重庆跟你那里差不多，三五年遇不到一场雪的，昨天夜里却积了半尺厚。

这电话就像雪天里的一盆炉火。

文博和我一样，心里有了怀想，而且想起了我。到底是兄弟。

然而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他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任务交给我；当然，说是有事求我也行。

他要我写一部有关重庆大轰炸的小说。

对这种事，我是向来不会接手的，哪怕托付的人是再好不过的朋友。小说跟植物一样，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气候，才会呈现什么样的春天。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重庆大轰炸”那棵树。

文博开始骂我了。骂一阵就给我讲道理。他的道理没能打动我。包括他说你老家属重庆管辖，难道你就不想为老家的文化事业做一点贡献？

也没能打动我。尽管我从事着文学的职业，看上去是一个文化人，却越来越不懂得什么叫文化。我就在一方小小的自留地里，弄出些花花草草的文字，换几文稿费，维持与世无争的日子；运气碰对了，那些花花草草说不定就成了畅销货，一时间洛阳纸贵，成就我名利双收，顺理成章又如愿以偿地跻身于中产者之列。

如果说“人人都有梦想”这句话是成立的，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或许又要骂：“这人真不可救药，连梦想也那么世俗。”

骂得好！我认账就是。然而，我在世上已经混了三十八年了，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知道什么样的梦想才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我从来就没奢望过要为哪里的文化事业做什么贡献。

文博呵呵呵笑，笑声像晒过几天的，很干。

但他是领导，领导说出的话是不好随便收回的。

他说我不管你咋想，这趟活你必须接，实话告诉你……

我不想听他的大话，急忙打断他：“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对那段历史太陌生了。”

他说嘿，自家兄弟就是作家，我还去请谁？有直路不走我走弯路？

然后他进一步说服我：“资料多的是，去网上一搜，够你看一辈子。而且我还为你准备了现成的资料，满满一皮箱，是一个人的笔记。这个人名叫黄晓洋。黄晓洋你听说过吗？他曾祖父是当年中央大学的名教授，爷爷、大伯和父亲，卢沟桥事变后都先后逃到重庆，在重庆亲身经历了长达五年半的大轰炸，大伯黄伯道还是个音乐家，轰炸期间常常去国际广播电台演奏，那可不是一般人能进的场所，宋美龄当年向西方发表演讲，反对重欧轻亚，争取国际援助，就是在那家电台里；黄晓洋本人，是渝州文理大学教师，也是著名的二战史专家，研究的重点就是重庆大轰炸。他的研究方法跟别人不同，别人是在时间的裹尸布下去发掘骸骨，他是把裹尸布揭开，让历史在太阳底下活起来。这样一个人的笔记，你想想有意思没有？你只需要根据这些材料，编圆一个故事就行了！”

听上去，这似乎是个可行的方案。

但我说过，我的这块田里长不出那棵树，根据一些死气沉沉的资料

和别人的笔记，就去创作一部小说，对我也过于新鲜。何况是“遵命文学”。

文博急了：“没见过像你这么瘟的人，写不写无所谓，到重庆来玩两天吧，你不想来看我，就来看看重庆的雪……别多话，现在就出发，我丢下工作陪你！”

说完，他把电话挂了。

紧跟着又打过来，补充一句：“我等你吃午饭啊。”

五个小时后，我跟文博坐在了了一起。

他确实是在等我吃午饭，也确实一直陪着我，但不是陪我玩，而是四处走访。走访的地方，是他事先安排好的，因此可以说，我基本上是被他控制起来了。他说你不是对那段历史陌生吗，我让你产生一些实感。言毕将我撵进车里，去了曾家岩的周公馆、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旧址、全家院子的郭沫若旧居、黄山的蒋介石官邸，然后又去了重庆大学松林坡、中华路十八梯隧道、邹容路国泰大戏院。每一地都是走马观花，国泰大戏院还改为了国泰电影院，十八梯隧道锁着铁门，根本进不去。说真的，匆匆忙忙走这一趟下来，我不仅没产生实感，仅有的那一点历史知识，也像松软的积雪，被凌乱的脚步踩踏得七零八落。

第二天下午5点过，文博才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打开立柜，费力地提出一口皮箱。

皮箱很旧，浅棕色，他把它推到我面前，咕哝一声：“可惜。”

“可惜啥？”

“这个人死了。”他用手指头把皮箱戳了几下。

他每戳一下，我胸腔里就蹦跶一下。

“多大年纪？”

“四十三四。年龄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他是上吊死的。”

文博扔给我一支烟，接着说：“别人上吊是用布条、绳子或电线，他是用铁丝。他坐在地上，铁丝一头套住桌腿，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你知道，这没法上吊。他是被勒死的——自己把自己勒死。”

“……知道原因吗？”



“谁知道呢……肯定与这些笔记有关哪。”

到这时候，我的兴趣才算真正提起来了。

“你看过这些笔记吗？”

“没有，我一天文件都看不过来。黄晓洋死后，他爱人很悲伤，也很自责，把他的笔记收集在这口箱子里，专门送到我这里来。她送来不是让我看，也不是让我替她保管，而是托我找个可靠的作家，仔细阅读之后，写写她的丈夫。她认为她丈夫是个很独特也很复杂的人物，她一个人无法看透他的内心，希望有更多的、更聪明的人来帮助她审视。她名叫杜芸秋，是个画家，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被誉为画坛才女。杜芸秋是我表姐。”

“这么说来……”

“对，你纯粹是帮我私人一个忙，了我表姐一个心愿。”

次日早上，我带着那口皮箱，离开了重庆。

当时，我手上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当然要把那部长篇写完，才有心思去翻看黄晓洋的笔记本。

然而，等到真正完成了那部小说，我觉得，初始对黄晓洋的那份兴趣，已淡若轻烟。

人总是要死的，死的方式各有不同而已。有人说，出生就意味着死亡，是“充满光和骇人的脸庞的死亡”。既如此，死亡就与生命共存，是“生命的事实”，勿需悲伤，也不必兴奋，总之没什么大不了的。休息一阵，我又打开电脑，写别的小说——属于我的小说。

一晃几年过去，我没有去碰过那口箱子。

文博也没有催我。或许，他以为我这么慢，是在下细打磨，对他表姐和表姐夫负责呢。

如果不是又迎来一个下雪天，我很可能就会把那口箱子彻底忘记，直到杜芸秋提出收回。

这天清早，我推窗一望，见花园里的刺柏树白乎乎的，即刻兴奋地爬上楼顶，看雪景去。楼顶平台是公共区域，光光赳赳地铺着隔热板，

我嫌不好看，春天的时候，去菜贩手里要了十多个大竹筐，装上土，种上南瓜、丝瓜、牵牛花，还种了桃树、桂树、枇杷树……南瓜和丝瓜早就收了，牵牛花早就败了，桃树的叶子昨天还残存一些，今早片叶不存。是风把它们扫光了。昨夜除了下雪，还刮了一夜的风，风从城外跑来，像披头散发的妇人，带着满腹的伤心事，把城市撞得乱响，也把城市吹得冰凉。现在风停了，雪还在下，泡酥酥的雪花盛满了竹筐，枇杷树肥大的叶片，手掌似的将雪托起。

天空比往日更低，城市比往日更安静。

我心里再次蠢蠢欲动了，像在很深的地方，埋着一个什么活物。

那活物终于蠕蠕地爬了出来。是那口箱子。

箱子竖着放在背角的壁橱里，自从放进去，我就没朝那方向去过。

今天，我却想去看看它了。

刚走到壁橱门外，我就听到一种细微的却抓人魂魄的声音，如钟磬鸣响。打开门，声音就停了。我以为那声音是从楼下传来的，可试了几次，都这样。那声音的源泉，来自于一个死后的生命。

它是在提醒我、呼唤我抑或责备我吗？它是想质问：死亡真的就那么无足轻重吗？

“死亡是在开口说话，有它自己的语义。”我的一个西方同行这样说。

他又说：“我们不应当无视一个男人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什么样的生存环境中死亡的。”

听到壁橱里的声音，我觉得，那个西方同行是在半个世纪前对我说话。

我感觉自己有一种深沉的接受，于是把箱子取出来，提进了书房。

黄色铜扣并未上锁，一摁就开了。樟脑味儿惊惊乍乍地跑出囚笼，烟雾那样弥漫了屋子。

真是满满一箱，明显经过整理，用绿色绸带扎成了好几捆。

原来不止笔记，还有日记、卡片、剪贴本、影印件以及大量的书信。与日记和书信相比，笔记的数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因为影印、剪贴和

卡片都粘贴在笔记本中，才有了厚厚几大册。

出于好奇，我先看日记。看几则没看出特别的，又把信件打开。绝大部分是黄晓洋跟他父亲的你来我往（他写出去的，都是复印件），有的长达万言，有的只寥寥几笔（日记也一样），分明署着同一个人的名字，有的字迹工整漂亮，有的却潦草至极。我随便抽出一封，只读了一小半，就改换了坐姿——本来斜躺在椅子上，一条腿跷起来，压住扶手，现在规规矩矩地坐正了。

读了几封书信，又回过头去读日记。粗略翻阅，发现其中四本，主要写他在南京的学习和教书生涯，虽有不少堪称精辟的见解，字里行间却没脱离学生腔；当然也有贯穿他整个生命的迷惑，但那迷惑还处于自发阶段。待他离开南京，踏上重庆的土地，自觉意识才陡然显现。

从这天早上开始，除了吃饭、上卫生间和越缩越短的睡眠，半个多月，我都把自己锁在书房里，阅读那些文字。这期间，我没下过楼，没见过一个朋友，没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接过一个电话，是否跟家人说过一句话，记不清了。

当我带着一双严重发炎的眼睛把箱子腾空，我承认，用我这支描惯了花花草草的笔，来根据黄晓洋的材料写一部作品，简直是亵渎。是的，亵渎，毫不夸张。杜芸秋要是希望让更多的人帮助她认识自己的丈夫，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箱子里的文字原封不动地发表出去。

只是有个问题，这些东西太凌乱了。

我刚才说明显经过整理，是指分了门别了类，比如日记一捆、信件一捆，但全没分出先后，连日记也不例外。这不是故意不分，而是没法分。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历史学家，黄晓洋竟那么不把时间当回事，剪报除个别页边上带着刊期，都没标注时间，书信也不署日期，他写给别人的不署，别人写给他的也不署，像跟他联络的，都是没有时间至少是藐视时间的人；日记应该有时间吧，的确有，但只有日，没有年和月，是真正的“日”记。我在阅读的过程中，经常为一些事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是很后来，读到某些段落，才恍然大悟。我不停地掉进陷阱，然后又从陷阱里爬起来。

如果原封不动地发表，我相信很少有读者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耐心。那实在是一段辛苦路。

“我应该来做这工作……”这是我对自已说的话。

我要将它们重新整理，寻找出其中的因果，使之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

没等眼睛完全好转，我又把自己像上次一样，锁进了书房。

这次花去了更长的时日，当我从书房里出来，枝头上鸟鸣如水了，楼底下玉兰花开了，我的那些大竹筐，盛不下逼眼的绿意了——春天到了！

事情并没有完结。

我需要采访一个人，否则故事无法勾连和贯通。

这个人黄晓洋的遗孀，杜芸秋。

我与孙文博联系，说为那部书的事，我要见见他的表姐。

我是悬着一颗心的，生怕杜芸秋已经再嫁，为不打搅自己平静的生活，她不愿再提及旧事了。

文博却长出了一口气，“我的天啦，”他说，“我以为……”

然后叫我等着，说他知道表姐在家，但她在准备一组有着共同主题的一系列作品，打算适当的时候搞一次个展。她的作品已经够多了，举办个展绰绰有余，但她认为那些作品都是零敲碎打，就像互不相关的溪流，无法汇成江河。“我先跟她联系一下，”文博说，“五分钟后再打电话给你。”

不到五分钟电话就过来了，他表姐表示，她再忙，也要抽时间见我；还说，如果我不方便出行，她可以在三天后的周末跟文博一起来找我。

我也长出了一口气。但我说免了，还是我到重庆吧。

人在自己熟悉的地盘上，哪怕会见陌生的访客，也更能把本真的一面保持住，到了外地，就会“端”起来，变得不是他自己。我希望杜芸秋以她最自然的姿态和最自然的语调，接受我的采访。

其实，对那个才华横溢激情四射的女人，我应该早就认识了，黄晓

洋的日记对她有诸多描述，但见到她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惊讶。

不加约束的长发，没错，黄晓洋写过的；长脸，长身，长腿，脸部和额头都朝后扬，给人迎面受风的感觉，也没错；谈论任何问题都不回避，言词优美并加上适度的想象，出口就让人印象深刻，同样没错。让我惊讶的是，她显得那样安静。只是说到少数几个地方时，才破坏了她的安静。

我俩在她的画室里，前后加起来，说了两天半的话，她都坐在一米高的藤凳上，腰板打直，两腿并拢，而且始终只露出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用头发遮住——左眼遮一会儿，将头摇一摇，左边的发丝被摇开，右眼又被遮住了。她似乎只愿意用一只眼睛看世界。

当她离开座位的时候，比如说，她上洗手间，或起身为我和她自己续茶水，我会抓紧时间做一下实验，蒙住一只眼睛，看看眼前的景象会出现什么不同的效果：失去了宽阔，却增加了锐利。

画室里，挂着几幅她创作的人物画，还有几幅尺幅较小的静物画，跟她开聊之前，我就认真看过的，开始没品出特殊的意味，现在感觉到了它们的锐利。画上的那个女人，头上层层叠叠缠裹着浴巾，脖子却细如竹筷；那个双臂半张的男子，私处奋力勃起，却眼窝下陷，嘴唇瘪缩，肋骨根根可数。显然，有一些东西他们无力承受。还有那只苹果，尾部的两片叶子清绿如洗，果身却开始腐烂了。

对妻子的这一面，黄晓洋从未加以描述。

即便涉及到妻子的激情，也更多地只把她当成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采访结束，我把我的设想——将黄晓洋的资料和对她的采访整理后发表——对杜芸秋讲了，而且强调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偷懒。

她这时候露出的是右眼，那只右眼跳动了一下。

“是全部内容？”她问。

“当然不是。黄晓洋那里，主要部分是他的日记，也只是日记中很少的一部分，最多十分之一吧。”

“为什么选出这十分之一？”

“这正是我要跟你商量的。我选它们，既不是因为它们温和（相反，

富有力量），也不是因为它们不牵涉隐私（相反，有大量隐私），我选它们的最高原则，是怎样相对圆满地达成你的愿望。只是，你愿意做出一二点妥协、付出一点牺牲吗？我的意思是，你不介意暴露自己的隐私吗？既然不是我的创作，而是黄晓洋的日记、书信等等，我就连人名、地名，都不想改动，事实上我也没有改动的权利。”

她暂时没回答我，点燃一支烟。藤凳旁边，小狗似的偎着一方木凳，正方形的镔铁烟盒，放在那方木凳上。她抽烟的姿态同样是安静的，烟雾很优雅地从嘴角和鼻孔里出来，形成弯弯曲曲的淡黄丝线。竹制的烟缸开始也放在木凳上，抽烟的时候，就一只手捧着。

“没关系，”她终于说，“既然不是全部内容，而是有所取舍，就可以将它视为一部作品。取舍本身就是创造。如果真是一部出色的作品，每个读者既是读别人，也是读自己，所以就不存在什么隐私了；至于上面有我杜芸秋的名字，那只不过是符号，换成张芸秋、李芸秋，也是一样的。”

我很高兴她能这样理解。

“还有别人的呢？比如李教授、安志薇、你父母……”

“这样吧，麻烦你给我开个名单，我去做他们或他们后人的工作。三天后我没回你，就证明都同意了。本来没这个必要，他不在了，但他活过，他活着的时候有权对人和事发表看法，是对是错，而今还活着的人，可以继续辩论的。嚯，辩论这个词用得不要，生者跟死者辩论，失败的永远是生者。这不公平。说申辩更恰当。活着的人可以申辩，即便死者说错了，也还有纠正的广阔天地。不过依你的，我还是给他们打声招呼吧。”

这时候是下午4点过，我感觉有些累——你跟一个脸像被大风吹过、且只露出一只眼睛看世界的女人说上两天半话，你试试看累不累！——就不想在重庆逗留，想马上回去了。

文博忙于接待几个台湾来的投资家，带着他们去歌乐山以北的郊外（城市正飞速扩张，很快就不是郊外了），考察一个青砖绿瓦的地主庄园，看是否有改造成高级会所的价值和可能。我给他打过电话，就去了

火车站。但文博派他手下去火车站把我拦下了，说这次太怠慢我，他一定要陪我吃顿饭。

饭桌上并没有那几个投资家，看来谈判并不妥当。文博暗淡的眼神也证明了这一点。但作为领导，他知道无论多么沮丧，都应该在人前及时为眼神充电，于是他的眼睛又亮起来了，兴致勃勃地问我：“聊得咋样？”我说很好。他说我让司机接我表姐去了，很快就到，吃饭的时候，你们再聊一会儿。

我顺便细声问了一句：“你表姐没再成家？”

“没有。”文博说，“我们也劝她再找个人，她总是摇头，她现在如果不拿画笔，便心若止水……”

正说着，司机进来了，说“秋阿姨”在画画，不来吃饭了，但她拿了个盘，让司机转给我，说盘里有段录音，是黄晓洋去世的次日，某家报社采访他最好的朋友时录的，接受采访的当天夜里，朋友反悔，没同意将自己的谈话发表，还去报社复制了谈话录音，交给了杜芸秋。可能有澄清的意思吧：尽管不同意发表，但我也并没说什么出格的话。杜芸秋让司机转告我，如果我用得着，随使用。

回家后，我拟了个详尽的名单，发到了杜芸秋的电子信箱里。

然后又等了三天，未收到杜芸秋的回话，我便放心地坐下来，开始工作。

在整理和输入电脑的过程中，遇到了两次意外，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我更没想到的是，这两次意外不仅没影响这部书，还构成了它必不可少而且意味深长的补充。

文中注释，为整理者所加；某些字体的变化，也是整理者为醒目起见所作的调整。

——好了，现在就开始吧。

## 第一章

# 杜芸秋访谈录

是的，晓洋是那年秋天到的重庆。当时他研究生毕业两年，在南京某高校历史系做讲师。那半年没给他安排课，他就到重庆来了。

你别以为他到重庆是考察大轰炸的，他那时候的主攻方向还放在沿海战场，像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他生在南京，长在南京，能在那块地面上，闻到时间深处的气息。他写过一本书，叫《南京第十三》，听上去像篇散文的名字，其实是部历史著作，也是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研究生把论文写成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并不多见，他不仅写了，还出版了，且很快被译成英、德、韩文，受到学界的赞誉。但他自己对这部书的评价很低，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

他这人，表面豁达，骨子里面其实是相当极端的。极端而且固执。

事情明摆着，如果他按照《南京第十三》的路数往下走，前景将是一片光明。

可他偏偏不那样走。

我曾经问过他原因。

他的回答是：“看上去我在揭示，事实上我在遮蔽。”

他这话我能够理解。跟他恋爱不久，我就读过那本书。不是他推荐给我的，他自己连样书也没留，我也根本不知道有那本书的存在，隔行如隔山嘛。还是父亲告诉我的。我父亲当时在渝州文理学院生物系当主



任。渝州文理学院开始叫渝州文理专科学校，1980年升为本科，叫渝州文理学院，十多年后又叫成了渝州文理大学。有天，历史系一位老师对我父亲说：“你女儿有眼光呢，找了个才子！”

晓洋来重庆，是有事找生物系的李教授，我父亲接待的，父亲对他的印象很好，1米83的个头，又文质彬彬，但并不知道他在史学界已小有成就。这天父亲听历史系那位老师把那本《南京第十三》吹得天花乱坠，心想不过是同行间相互捧场，图的个让人喜欢。但他还是很兴奋，回家马上告诉了我。

我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大四学生，立即去图书馆借来，花一个白天一个晚上，把书读完了，从中知道了很多事。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课本上学过，我还看过至少两部以此为题材的电影、三部幸存者的回忆录，但晓洋的书依然让我震撼，让我觉得陌生和新奇。当然，我也知道还会有更多的震撼、更多的陌生和新奇，被埋在水面之下。这就是他所谓的“遮蔽”。

每一种揭示，不都意味着遮蔽吗，这是事物本身的法则，没啥值得羞愧的。

晓洋却羞愧得不行，知道我读了那本书，他很不高兴。

他说：“无聊。”

是说那本书无聊，不是说我无聊。

接着又强调一句：“无聊透顶。”

他就是这样极端。你从他的死，就知道他有多极端，多固执，多执著。他对死也很执著。他有三次寻死的经历，两次跳水，一次上吊，两次跳水都没死成，因为他会游泳，而且还有人救他。第三次终于成功了。这三次寻死，是在八天之内完成的。执著，有时候真不是好事……

在他的血统里，有一些比较混乱的因素。他爷爷的爸爸，是大教授，爷爷的爷爷，是江阴乡下的大地主，再往上溯，是小地主、投机倒把的商贩、手艺人、自耕农、无产者。他们黄氏家族，奋斗了好多辈人，终于把“无产者”像掐臭虫那样掐死，踩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曾祖父抛弃了土地，也抛弃了土地赋予的对生活的想象。爷爷虽没干过一天农